

# 边塞诗派评价质疑

——三十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吴学恒 王绶青

边塞诗派是伴随着盛唐时期的民族矛盾而逐渐形成的。这派诗人以岑参、高适为代表,尚有李颀、王昌龄、常建、崔颢、王之涣等人。他们有的侧身戎幕,有的关注边事,写下许多反映民族战争的歌行律绝。

对于这个诗派,三十年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多是肯定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在研读了这派诗人的作品,考查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战争性质之后,觉得历来对边塞诗派的评价是不当的。如何评价这个诗派,关系着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必须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代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作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论,才能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 一

边塞诗派活动在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当时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在东北的有奚、契丹,北有回纥,北及西北有突厥,西及西南有吐蕃,南有南诏等。开元初年,唐王朝统治者在前代奠立的基业上,还能任用贤臣励精图治,以致出现了史称的“开元盛世”。玄宗初期,四邻大都向其纳贡称臣,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间有进扰。这时期唐王朝的偶尔用兵,多属抵御性质。由于抵御,进而

反击,也很自然。不过,反击应有限度。以后唐王朝竟无端出击,奴役、掠夺和屠杀少数民族人民,这就纯然是实行民族压迫了。

开元中期,玄宗即“有吞灭四夷之志”<sup>①</sup>,“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以移之”<sup>②</sup>。被四邻称为“大可汗”的唐王朝,对少数民族除以重兵镇守外,还利用挑拨离间、联此击彼、“以夷制夷”等手段,制造民族仇杀与不和,使边地的烽火常年不熄。

从《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有关史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唐玄宗自开元后期起,对四邻用兵的目的、性质和后果。

先看对奚、契丹。开元末,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即屡屡攻伐奚、契丹。之后,张守珪扶植起安禄山、史思明,侵犯更为加剧。天宝年间,安禄山一面以边功市宠,对奚、契丹大肆征讨,一面积蓄作乱的力量。显然,唐对奚、契丹的战争,自开元末就是不义之战。

再看对突厥。开元以来,突厥屡求和亲,而唐王朝统治者以为“兽心难测”<sup>③</sup>,竟时常寻隙出兵。天宝初年,又乘其内部之乱,与回纥联兵进犯。这样,本来可以和睦相处的突厥,其一部分硬被用武力夷平了。

再看对吐蕃。远在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藏,就“和同为一家”<sup>④</sup>。开元中,唐王朝对吐蕃用兵“拓境千余里”<sup>⑤</sup>,演成西方边境

长期的军事冲突。天宝八载，哥舒翰以数万人的生命换取石堡城（按，即吐蕃铁仞城），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讥讽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十二载，哥舒翰更收睿宗时即让与吐蕃的九曲。这些，当然都属于不义战争。

至于天宝年间唐王朝对南诏的屡次征讨，“分道捕人”，致使“行者愁怨”，“哭声振野”<sup>⑥</sup>。连连败绩，其战争性质更是一目了然。

“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sup>⑦</sup>唐玄宗自开元后期起劳师伐远，“困天下以养乱”<sup>⑧</sup>，其后果是连同汉族人民在内的各民族劳苦大众的死亡，生产备遭破坏，阶级剥削和压迫更加惨重，社会发展受到阻碍。“兵犹火也”，玄宗政权也正是玩火自焚的。据史书记载：“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sup>⑨</sup>最后终于酿成安史之乱，李唐王朝一蹶不振。“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sup>⑩</sup>唐的由盛而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

历史的事实表明，玄宗时期民族矛盾的主导方面，即挑起衅端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唐王朝统治者，当是无可疑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杜甫以饱含血泪的诗笔，严斥唐明皇“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天宝年间，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岑参、高适相继投身幕府，写就大量的边塞诗，放声高唱唐王朝实行民族压迫的暴行，用他们的笔和剑支持了不义战争。对于这个诗派，应该怎样评价呢？下面试就这个问题谈些我们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 二

八世纪上半叶，主要由唐王朝统治者发动的民族战争，牵动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人们与沙场的联系日趋密切。当时一些出身

于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如岑参、高适、崔颢等，大多怀着建功立业、消灭异族的愿望，奔赴边塞。扩边战争激发了他们的“志向”，边塞风光开阔了他们的视野，长期的军旅生活，也促使他们看到了严峻的现实，这些就构成他们创作边塞诗的生活基础。而另一些诗人，如王昌龄、李颀等，虽然没有亲历戎马生涯，但内地与边事休戚相关，也触起他们以边塞为主题的创作冲动。于是，这个诗派便自成一军出现在唐代诗坛上。

据初读这个诗派的全部作品所见，颂扬和揭露战争是其中的两大主题。当他们热烈追求功名富贵而仕途通畅的时候，便不惜以浓重的笔墨颂扬唐明皇的“武功”；但当他们在仕途上遇到挫折，或是多少看到些民生疾苦的时候，也能揭露民族压迫的罪恶。后者多集中在未曾出塞的诗人的作品里。

我们先来谈谈他们那些被称誉为表现出所谓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然后再说说他们那些在历史上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作品。

盛唐诗坛有“诗家夫子”<sup>⑪</sup>之称的王昌龄，虽未曾出塞，但由于向往边功，起初对唐玄宗的扩边政策也是赞赏的，写有不少颂扬之作。诸如“大将军出战，白日暗榆关，三面黄金甲，单于破胆还”（《从军行》）：“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变行路难》）：“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之四），以及“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从军行七首》之五），等等。

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岑参、高适，都曾两度出塞。

天宝八载到十载，岑参第一次出塞，赴安西。写诗颂扬“欺诱贪暴”<sup>⑫</sup>的高仙芝。后高大败，岑参于归途中，仍鼓动“万里西击胡”的副使：“功名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但总的看来他这次出塞“寂寞不得意”（《安西馆中思

长安》,因此写下许多思乡诗。天宝十三载,岑参第二次出塞,赴北庭,颇受主将封常清的赏识。过去他曾自比石上藤:“不逢高枝引,未得凌空上,何处堪托身,为君长万丈?”这回算是找到了托身之所,他写道:“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并写有《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使交河郡献封大夫》、《灭胡曲》等诗,吹捧在西北边地实行民族压迫的封常清:“亚桐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请听他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之一:“汉将承恩西破戎,捷书先奏未央宫,天子预开麟阁待,祇今谁数贰师功。”这是怎样在给主帅歌功颂德?再听凯歌之三:“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丈夫鹊印摇边月,大将龙旗掣海云。”这是怎样在描绘笳鼓声中不义之师的“凯旋”?至于凯歌之五:“蕃军遥见汉家营,满谷连山遍哭声,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凯歌之六:“暮雨旌旗湿未乾,胡烟白草日光寒,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这又是怎样在为手执屠刀的武将喝彩?!从他奉献的这一首首“凯歌”里,不难看出岑参的内心世界,所谓“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并不如某些文学史所美化的是什么“岑参边塞诗歌的主题”<sup>⑩</sup>,而只不过是唱高调罢了。当真“一身无所求”,何必这般殷勤地献诗呢?

岑参如此,再来看看高适。

天宝十一载,高适怀着“一朝感推荐,万里从英旄”<sup>⑪</sup>的思想,投奔哥舒幕府,被表为掌书记,是官运亨通之始。他喜出望外地唱道:“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与其说这是“以英雄的姿态嘲笑了老于庸下的

文士”<sup>⑫</sup>,勿宁说这是一种利欲熏心的狂态!天宝十二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悉收九曲部落。……是时(唐王朝)盛强,自安远门(即长安西北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sup>⑬</sup>为投靠哥舒翰以谋取功名富贵的高适,不顾杜甫的规劝:“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却向“因麦庄一捷而黠武穷荒”<sup>⑭</sup>的哥舒翰大加捧场。什么“长策一言决,高纵百代存,威稜慑沙漠,忠义感乾坤”(《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什么“拔城阵云合,转旆胡星坠,大将何英灵,官军动天地。”(《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迴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

更为可笑的是,天宝十载唐王朝征南诏大败,当政的杨国忠竟“隐其败”,为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奴役,于天宝十三载又命“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皆没”,“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sup>⑮</sup>高适呢,在《李云南征蛮诗》里,曾为之大唱赞歌,这个督战的主将李宓在少数民族的抗击之下最终被俘,对于高适,实在是极为辛辣的讽刺!

李白就严厉谴责了“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古风》三十四)的征南诏的战争。直至中唐后期,白居易追叙唐玄宗这种民族压迫的暴行时,依然愤愤地写道:“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黠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足见不义战争在人们心灵中所留下的创痕之深。

鞭挞与歌颂,对照得竟是如此鲜明,孰是孰非,岂不昭然若揭?!那么,为什么有的文学史著作,会称赞边塞诗派的“诗歌中具有爱国感情和积极的精神力量”<sup>⑯</sup>呢?为什么有的文学史著作,一方面指出开元天宝时代上层统治阶级“却又好大喜功,不时发动开边拓土的战争,消耗国力,贻害人民”,另一方面又说边塞诗的作者“表现了驰驱沙

场,建立功勋的英雄壮志,抒发了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sup>②①</sup>。打倒“四人帮”之后出版的《唐诗选》,在“前言”中既已明确天宝以后的战争性质主要是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伐,却又认为恰是活跃在这个时期的“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正确地歌颂了将士们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英雄气概”<sup>②②</sup>,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出现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的民族偏见在作祟,以致不能完全正视当时战争的性质,或是采取笼统地否定、具体地肯定的态度,以致不能完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盛唐时期主要由唐王朝统治者挑动的民族战争,完全是为了加强阶级统治、实行民族压迫,以满足统治集团更大私欲的一种手段。一些边塞诗人沉醉于这一时期表面的升平景象,无视所隐藏的严重危机,其中大多是开元天宝间的进士,有的更为了猎取功名富贵而走向沙场。所谓“积极上扬”“乐观进取”的诗篇,正是他们得志时的产物。我们看到,与岑、高同时代的杜甫则抱着不同态度,因为“那时的战争是不义的战争,杜甫是无条件反对的”<sup>②③</sup>。在《前出塞》等诗里,杜甫就责问道:“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在《兵车行》等诗里,他更揭露了扩边战争所带来的民生凋蔽的恶果。杜甫不仅没有参与这种战争,相反地却对统治者的贪暴行为进行了口诛笔伐,对人民的灾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显然,杜甫的态度是正确的,而边塞诗人讴歌不义战争的诗篇,则是理应受到批判的。

### 三

边塞诗派创作的价值何在呢?我们以为主要是在他们仕途不得意,或是受到严峻现

实的教育,所写下的那些揭露不义战争的作品。

开元末,当诗人高适“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北游边塞的时候,正值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扶植安禄山、史思明横行于林胡(按,即奚、契丹——战国时林胡地)。由于高适对现实抱着较为清醒的客观态度,所以开元二十六年与自张守珪处还京的客人唱和时,记起张的的轻易用兵,并喜饮宴作乐,乃作诗以讽刺,创作了名篇《燕歌行》。诗中以鲜明的对比手法,通过典型场面的剪影,揭示出军中的黑暗和兵民的苦难:“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天宝八载,高适作了个小小的县尉,曾送兵到蓟北,第一次正式出塞。看到“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答侯少府》)的惨状,写有“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蓟门五首》)等,谴责不义战争之作。不久,他因“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而辞去封丘尉。可惜的是,如前所述,高适自入哥舒幕府后,青云直上,以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sup>②④</sup>。于是,狂热地歌颂起唐王朝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压迫,而《燕歌行》等诗中描绘的景况,似乎忘却了。

岑参正值唐王朝扩边政策达到顶点之际,第二次来到边塞。这时也正是唐代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边将军阀飞扬跋扈、社会危机总爆发的前夜!诗人在送别主将出征、朝臣使节往还,或是奉陪主帅饮酒作乐、登高纳凉的日子里,得意于“吾从大夫后,归路拥旌旗”(《陪封大夫宴瀚海亭纳凉》),写有《白雪歌》、《热海行》、《天山雪歌》、《火山云歌》等描绘边塞风光的诗篇,创造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画面,开拓了一定的美学境界。但这种春风得意的日子并不多长,时间略

久，他的“理想”随着玄宗政权的“日落西山”，而受到现实的嘲弄，终于发出悔恨之声：“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北庭贻宗学士道别》），目睹血染沙场的征人，因朝廷赏罚不公而功名难立，联想到自己前途渺茫，当年那种万里封侯的热烈期望慢慢冷却下来，他写道：“沙场见日出，沙场见日没，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日没贺延碛作》）“白发轮台使，边功竟不成，云沙万里地，辜负一书生……”（《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这种心绪与征戍士卒的感情，有了某些相通之处，加以长期的军旅生活，也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扩边战争的本质，于是，便用他的笔锋挑开珠帘罗幕，揭露了军中的不平，讽刺了将军的荒唐。在《玉门关盖将军歌》的结尾，竟直呼这个将军为“旧酒徒”了；在《赵将军歌》里，更活画出一个赌徒的形象。这和前面所提到的对封常清的歌颂，俨然成了对比。

晚年一窥塞垣的崔颢，也曾写有《辽西作》：“……寒衣著已尽，春服谁与成，寄语洛阳使，为传边戍情”，表现了对士卒的关心。

一些未曾出塞的诗人，如李颀、王昌龄、常建、王之涣等，在正视现实之下，也逐渐由向往边地转为非难征伐，写出不少关怀民生疾苦、同情征人戍卒的篇什。

仕途颇不如意而沉沦于社会下层的诗人常建，就留下了古战场的悲歌：“翩翩云中使，来问太原卒，百战苦不归，刀头怨明月。塞云随阵落，寒日傍城没，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塞上曲》）；“龙斗雌雄势已分，山崩鬼哭恨将军，黄河直北千余里，冤气苍茫成黑云”（《塞下曲四首》之三）。王昌龄在《代扶风主人答》中慨叹道：“十五役边地，三回讨楼兰，连年不解甲，积日无所餐。……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乡亲悉零落，冢墓亦摧残，仰攀青松枝，恸绝伤心肝。……”刘湾就在《出塞曲》里直接喊出

“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的悲愤之言！

诗人们也以同情的笔触，抒写了征人思妇的离愁闺怨。王翰的那支洞察心灵的诗笔，数语竟刻划出征人在不义战争中的变态心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真可谓入木三分！王昌龄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委婉而巧妙地揭示出思妇的心理活动。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含蓄而曲折地表达了造成离愁闺怨的根源，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论：“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

王昌龄的那首被推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借古喻今，期望于朝廷用将得人。王之涣则直接谴责了唐玄宗的黠武政策：“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迴，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凉州词》之二）

更其难得的是，诗人们不仅揭露封建统治者的劫掠：“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而且同情受凌辱的少数民族：“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古从军行》）王昌龄的《箜篌引》还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被俘胡兵的悲惨境遇：“疮病驱来役边州，颜色饥枯满面羞，仍披漠北羔羊裘，眼眶泪滴深两眸。”斥责了黠武者的暴行：“将军铁骢汗血流，深入匈奴战未休，黄旗一点兵马收，乱杀胡人积如丘。”最后发出了“便令海内休戈矛”的祈望和平的呼声。

谈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只有这些反战的诗篇才值得肯定吗？回答是：除了揭露不义战争的作品应该称道之外，还有某些支持正义战争的篇章，同样应当肯定。

公元七五五年，久已伏下的统治阶级内部危机爆发了。从民族压迫战争中蓄养起来

的大军阀安禄山、史思明，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在河北发动叛乱，风驰电掣般地扑向河南、陕西，震撼了诗人们的心灵。高适面对着动乱，向出师戡乱的贺兰大夫倾吐激励之言：“鲁连真义士，陆逊岂书生，直道宁殊智，先鞭忽抗行”，抒发了“从来重然诺，况值欲横行”的平定叛乱的壮志豪情。（《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在鞍马上消磨了壮年的岑参，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才从边地东归，目睹军中腐败，生民涂炭，也为社稷危亡而忧心忡忡：“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埽，……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早知逢世乱，少小漫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行军诗二首》）虽然都是反映战争，可是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其意义也就两样了。

总之，边塞诗派的创作，应予肯定的正是这类谴责唐玄宗穷兵黩武、揭露军中黑暗、同情征人戍卒、支持平叛战争的诗篇。这些具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至今仍有其认识价值，使我们比较具体地看到唐玄宗时期进行战争的目的、性质和后果。

周恩来同志指出：“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是很多的。在各民族互相侵犯中，如果算总帐，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次数多、时间长。”<sup>②③</sup>这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具体到盛唐时期，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更使我们不难找到民族矛盾的主导方面。在主要由唐玄宗统治集团挑起的民族矛盾里，边塞诗派的一些诗人确曾扮演过不光采的角色，写下许多歌颂扩边战争的诗篇，这自然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因为自周秦以来，我们的国家就已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范围，一般不涉及爱国主义问题；在今天，我们一般也并无必要去纠缠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历史上的纠葛，因为这不利于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但是在不能不涉

及这类问题时，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历史事件作公正的评价。不然，这同样是不利于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的。在涉及历史上的这类问题时，我们要分清民族战争的性质，凡是实行民族压迫，阻碍社会发展的，就是非正义的，如唐代在开元特别是天宝年间所进行的战争，不仅没有促进国家的统一，相反却导致了国家的分裂，终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上民族压迫的残酷和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没有发现少数民族反抗压迫的悲壮诗歌。因此，我们不能用这方面的材料，进一步论述当时战争的性质和评价边塞诗派的创作。不过，这已不单单是对一个诗派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今后怎样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编写多民族中国文学史的工作了。

①⑨⑩⑪ 《资治通鉴：天宝六、三、十二、十三载》。

⑫ 《新唐书：吐蕃传》。

⑬⑭ 《旧唐书：吐蕃传》。

⑮ 《资治通鉴：开元十七年》。

⑯⑰ 《资治通鉴：天宝十载》。

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312 页。

⑲ 《新唐书：兵志》。

⑳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 年 8 月 24 日），《人民日报》1979 年 9 月 9 日。

㉑ 《唐才子传》卷二。

㉒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 8 月版，100 页。

㉓ 佚诗，见敦煌唐写本残卷。

㉔㉕ 《中国文学史》（二），文学研究所编，1962 年版，326—327、363 页。

㉖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1958 年版，95 页。

㉗ 《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 4 月版，13—14 页。

㉘ 《列宁论战争与和平》，人民出版社，9 页。

㉙ 郭沫若：《诗歌史中的双子座座》，《光明日报》1962 年 6 月 9 日。

㉚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列传第六十一。

㉛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79 年 12 月 31 日。